

論台灣華語的在地化

The Indigenization of Taiwan Mandarin

◎ 何萬順 / 國立政治大學

提 要：本文檢視相關文獻及歷史資料，從兩個層面論證台灣華語的本土地位：一、純粹從語言的層面歸納台灣華語在語音、語法與詞彙的特性，證實其自主性；二、從歷史的層面檢視台灣華語從始至今發展的時空及人口背景，證實其為台灣的新生語言，經過四個世代的傳承已經充分在地化，此一事實也充分反應在台灣人的語言態度上。因此，台灣華語與台灣社會存有獨特的雙向連結，應視為台灣的本土語言。

關鍵詞：台灣華語；母語；第一語；在地化；本土化

Keywords: Taiwan Mandarin, mother tongue, first language, Taiwan Mainlanders, indigenization

一 前 言

貓熊是中國的本土物種，因為只有中國有貓熊，而所有的貓熊也僅存於中國。櫻花鉤吻鱸是台灣本土物種，這也毫無爭議，因為櫻花鉤吻鱸與台灣之間同樣存有獨特的雙向連結。然而這個物種原本也只是台灣的“過客”，只因為大甲溪下游在一萬五千年前冰河期末期的地質大變動中被封，再也無法洄游到海洋；因此從此滯留上游，改變習性適應了當地生態，繁衍至今，成為台灣獨有的鮭魚亞種，甚且享有“國寶魚”的美名。如今台灣也

有了圓圓和圓圓兩隻貓熊，甚至掀起了“貓熊熱”；然而台灣華語與台灣的關係在本質上比較像在地的櫻花鉤吻鮀還是比較像貓熊？換言之，台灣華語究竟已經在地化還是未脫其外來本質。

在台灣的本土論述中，一般所謂的“本土語言”或是“母語教育”中的“母語”，是不包括台灣華語的，指的是台灣閩南語、台灣客語與台灣原住民語。例如《海翁台語文教學季刊》2009春季號的專輯主題正是“母語與華語的衝突”；這個主題隱涵以下兩個假設：一、“華語”不是本土“母語”；二、“華語”與本土“母語”存有衝突的關係。因此有學者以“戰爭”作為譬喻描述台灣華語與本土語言的衝突關係（參看洪惟仁，1995, 2002），甚至將台灣華語與少數台灣新移民所使用的英語和越南語等外語歸為一類：

華語可以是台灣的“國民的語言”（languages of citizens），但絕不是“台灣語言”（Taiwanese languages）。華語、英語和越南語及其它新移民的語言一樣，可以是台灣的國民在使用的語言之一，但都不是具有台灣傳統歷史文化代表性的“台灣語言”。
(蔣為文, 2005:vi)

然而也有少數本土學者持不同的看法。例如早於1993年黃宣範就在其巨作《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一書中，對於台灣華語做出以下的結論與呼籲：“台灣地區不同的語族四十年來自然而然整合出來的國語已具有明顯而獨特的面貌。這個語言是我們應該自傲的語言。”（黃宣範，1993:5）又如洪惟仁（2002:517）也接受“華語已經脫離了純粹標準語的高級語言角色，儼然成為台灣本土語言之一”，雖然語氣中透露了些許無奈。

本文企圖透過事實的建立以及邏輯的論證，從兩個層面證實台灣華語的本土地位。在第二節中，我們

先就純語言學的層面，驗證台灣華語不同於“國語”的人為標準、不同於北京話的獨立性。在第三節中，我們再從歷史的層面，追溯台灣華語的起源，檢視其發展的時空背景與人口結構，證實其在地化歷程。第四節是結論。

二 台灣華語的自主性

台灣國民黨政府從1956年到1987年之間實行“國語政策”，因此台灣華語一般稱之“國語”。因此，我們有必要釐清“國語”的內涵。“國語”雖是依據北京話為基礎所制訂，但事實上最初制訂“國音”的“讀音統一會”是由各省代表組成，並且是以“多數決”的方式逐一審議七千餘字的標準音（黃宣範，1993；Chen, 1996, 1999）。因此，實際上“國語”自始就不等同北京話。而在本質上，政府頒訂的“國語”也僅僅是一個人為的標準、一個在意識型態下的理想、一個形而上的靜態概念，並不是一個自然語言（黃宣範，1993:120–122）。因此，我們如果說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說“國語”，這是絲毫不誇張的。但是台灣有多少人說北京話？這才是一個可以探究的問題。

兩岸自1949年後完全相互隔絕的時間長達近四十年，而且各自經歷了驚濤駭浪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革。因此，早在二十多年前台灣語言學大師鄭良偉就在全世界最具權威的語言學期刊Language上發表論文（Cheng, 1985）論證台灣華語的自主性。他發現台灣華語在句法上受非官話的南方漢語影響較大，許多與北京話不同的地方可以從與台灣閩南語的接觸中得到解釋，但也有些特徵從語言接觸裏是無法解釋的，只能以普遍語法的“簡化”與“規則化”原則解釋。同年語言學者Kubler (1985) 也出版了專書，論述台灣華語在與台灣本土語言接觸的影響下，如何發展出自主的系統。台灣語言學另一位大師黃宣範於

1993所出版的巨作中，同樣認定台灣地區的華語已具有明顯獨特的面貌。

從八零年代末期李登輝的崛起至民進黨的八年執政，二十多年來本土勢力與本土意識的持續成長更加速了台灣華語在各個層面的在地化（參看何萬順，2005）。因此，在社會及心理的層面上台灣華語都更加容易接受在地閩客語的影響。此外，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的開放也使得台灣華語更容易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尤其是流行文化與商業文化；因此，相較於北京話或普通話，台灣華語中有較多的英文語法與詞彙以及日語詞彙。而吊詭的是，比起北京話或普通話，台灣華語也有比較多的古文句式和構詞；從中國大陸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與台灣同一時期的“文化復興運動”的鮮明對照，就可見一斑。新舊的交融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內涵，也形成其特點之一。早在1979年Kubler即認為台灣普遍使用的國語，由於在地閩南方言的影響，和多數當時美國中文語言紀錄已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範圍包括了語音、句法、字彙各個層面，因此台灣華語已經和香港華語和上海華語一樣，已可視為一個獨立的華語方言。然而十分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有語言學家將台灣華語做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描述，只有許多零散的、部分的、片段的、重點式的分析與描述。

在台灣華語的研究上，1985年是重要的里程碑，Kubler（1985）延續了以上的研究，全面性的調查台灣華語在語音、詞彙與句法上所受台灣閩南語和口語的影響，奠定了台灣華語研究的基礎。而更重要的是鄭良偉（Cheng, 1985）在語言學期刊Language上所發表的論文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台灣話、台灣華語與北京官話之比較》。該文確認台灣華語是一種語言的變體，和北京官話是不同的；當時80%人口以台灣話（閩南語的變體）為母語，因此雖然大部分的台灣人也使用台灣華語，但主要是以其為第二語來學習和使用，而北

京官話則被認為是標準國語。以現在的概念來說，鄭良偉（Cheng, 1985）的研究顯示台灣華語是台灣人在多數人的共同母語影響下，以北京官話為目標語，所發展出的“中介語”。因此，對於第一代（1950前出生）而言，台灣華語類似“涇濱語”（pidgin），傳承到第二代則成為“克里奧爾語”（creole），才正式成為新興的語言（何萬順，2009）。台灣華語的形成因此有三大要素：一當然是作為目標語的北京官話，例如零標記的未來式、簡單過去式和完成式之間的零差異、和在簡答句中使用動詞或形容詞來代替助動詞；二是台灣話和其它南方漢語的一些特徵，例如台灣華語漸漸趨向中國南方漢語的VO特質，脫離了北京官話受阿爾泰語系影響而具有的OV語言特質；三則是不同於南方母語、也不同於北京官話、而是語法上的簡化或規則化而產生的特質，例如台灣閩南語和北京官話的複數第一人稱代名詞都區分包括聽話者（如“咱們”）以及不包括聽話者（如“我們”）兩種形式，但台灣華語中無此區分，只用“我們”不用“咱們”。

Sanders（1992）則指出台灣華語情態動詞在語意上和普通話的不同，採用歸納法對自然錄音的語料加以分析，比較八個情態詞語的語義範圍及其使用頻率：包括“想、要、得、別、會、能、可以、行”。台北人傾向於使用“要”和“會”表示意願，而北京人則傾向於把意願隱含在句中而不用情態詞語。台北的“要”和“會”所涵蓋的語義包括“必須”和“禁止”的意義，但北京話中雖然也存在，但一般是由“得”和“別”分別表示。此外，台北國語傾向用“會”表示能力，北京話則傾向用“能”。台北國語明顯的傾向用“可以”表達相當於英文OK的意思，而北京話則通常用“行”。黃馨慧（1995）同樣探討台灣華語裡一些異於標準國語的句法變化，並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台灣華語的使用頻率。該文認定台灣華語裡的四大項特殊語法結構為：動詞前使用時貌標

記，如存在貌“有”，實時貌“要”，可能貌“會”，持續貌“在”、有關“來、去”的方向結構、功能詞“給”當受事或來源受詞的標記、“說”跟“看”作為引介子句的標記。語言的改變是一種連續且持續的發展，這幾個句型變化仍和相對應的標準說法同時存在，使用比例的多寡視個別句型改變的速度快慢而定。不同的族群、性別、年齡、學歷也會表現相異的使用情況。當時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有利於台灣華語的發展與使用。

另一篇重要的文獻是曾心怡 (Tseng, 2003) 根據在台灣所收集的實際語料，有系統的歸納出台灣華語在句法上不同的十個特點，包括“有、說、給、在、會、不行、用V的、V看看、不錯V”與“來/去+處所”等。該文比較它們在北京官話（也稱“國語”）、台語及台灣華語三者中的結構和功能的異同，並且同樣以黃馨慧 (1995) 的“連續面”觀念具體呈現各個句法結構在台灣華語中的穩定度。例如“有、說、給、在”在台灣華語中有多重結構，假設為A、B、C三個結構，若A已成為相當穩定的結構，被認為跟“國語”的一樣標準，而C是一般認為最不標準的，那麼A應會進入每個人的語言中，在連續面上它相當靠近“國語”；但接受A的人不一定接受B，有的人能接受A和B，有的人則對台語進入台灣華語的限制很少，因此接受A、B和C。決定這個連續面的重要因素是語言背景和教育程度。該文將台灣華語的特殊結構指出，供華語教師參考，也呼籲台灣的對外華語教學語言應有一致的規範。

Swihart (2003) 也指出中國大陸的普通話與台灣的國語一直被看作單一的標準，但實際上兩者在語音、書寫系統、詞彙和句法上的差異，已經形成了兩個不相同的漢語。例如普通話“研究”的“究”從第四聲調變成第一聲調，在普通話的“幼稚園”和台灣的“幼稚園”同義；句法上，台灣華語在動詞或形容詞之前加上助動詞“有”：他有沒有發燒？他沒有

燒。但在普通話中的表達句式為：他發燒不發燒？他不發燒。該文希望能引起在美國的華語教師和學生們對普通話和台灣華語不同用法的重視。

接下來我們檢視幾篇針對台灣華語中個別的語法特徵所做的研究。蔡美慧 (1992) 探討台灣華語肯定或否定答詞在對話中和敘述句或問句的運用情況。例如對方說：“今天天氣真好”，可以用“對啊，比昨天好多了”表示同意，或以“不會啊，我覺得好熱喔”表示不贊同。若有人問：“你是學生嗎？”可以用“是啊”或者“對啊”回答，也可以用“不是”或“沒有”回答。語料收集的方法是以錄音的方式，談話者的年齡是20-30歲間。研究發現X-X, Y-Y, 例如：是:不是，好:不好的所謂標準搭配方式不能完全應用在台灣華語。余瑞瑩 (2004) 則深入探討否定詞“沒有”在台灣華語的言談功能。透過口說的語料分析“沒有”在言談中的功能主要分為五大類：否定、緩和、規避/修正、話輪轉換、以及話題轉換。顯示“沒有”已跳脫原本純粹為結構成分（如名詞、動詞或形容詞）的否定詞用法，而具備言談標記的功能，表達前後語段的關聯。

台灣通行的華語受到閩南話影響，在語法上最明顯的結果之一就是“有”字的助動詞用法。盧廣誠 (1996) 探討這個語法現象並且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過量化分析，發現本籍、教育程度和年齡的確是重要的因素。如果單看閩南籍和外省籍在“有”字句的使用比例差距不大，而且在不同的語言變項中雙方數字還呈現互相有領先或平手的局面。但如果兼看本籍和教育程度的影響就發現閩南人中教育程度越高，使用“有”就越少；這種現象在外省人當中卻看不到。證明了省籍在語言行為上造成的差異，也顯示閩南人內部的差異性。國中以下程度閩南籍受試者使用“有”字句的比例明顯偏高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句法是來自閩南語的底層影響。隨著年齡層下降，某些“有”字句的使用快速攀升，然而有些用法卻隨著年

齡層下降而減少，可見閩南語中的“有”字的助動詞用法並非全面無條件的侵入台灣華語中，而是一種由閩南語觸動，繼而造成華語語法規律改變的過程。因此可以確定的是“有”字取代了“了”來表示完成的用法是來自閩南語的影響，而解嚴後語言政策的鬆綁，使得無論在口頭或書面使用的華語中，台語詞彙和句法都快速增加。

蔡美智（2002）也同樣由台灣華語的語法特點討論華語作為共同語和方言之間的互動；楊惠慈（2000）則對比分析台灣華語中“說”作為引介子句的用法與閩南語“講”。張瑞芬（2001）則研究台灣台語及華語的互動如何影響到“說”和“看”的語法化過程。台灣華語多義詞“說”有許多文法功能：動詞、補語、言談標記等。作者認為其語法化過程是從動詞→在多動詞句中是動詞或補語→補語→一般言談標記→表達性言談標記等五個階段。台灣華語多義詞“看”的語法化過程是動詞→副詞→補語→一般言談標記→表達性言談標記等五個階段。李生純（Lee, 2007）同樣從台灣華語和台灣閩南語接觸的角度，深入探究台灣華語“給”的演變。除了在北京話（國語）中以及受到台語影響而有的用法外，“給他/它動詞”的句式則反應了“給”在台灣華語中的新興用法，包括來源標誌，受事標誌，蒙受標誌等。該文也應用第二語言學習的機制以及詞彙重整等概念來解釋台灣華語中出現上述結構的成因，並且指出“給他/它”的語法化的原因有語言內部因素也有接觸引發的因素。語言學習者並非全然地接受目標語的輸入，或是學習不完全，他們也是創造者。

台灣華語在詞彙方面的創造更加豐富。黃國營也早於1988年就在《中國語文》期刊上發表《台灣當代小說的詞彙語法特點》一文，研究台灣作家的小說在詞彙與語法方面許多不同於普通話的特點。分析了二百五十萬字語料的結果發現，在詞彙上，台灣有許多反映其特殊社會環境的詞語，有些大陸已經不用而台

灣仍在沿用的舊詞語，還有不少新生詞語。閩南語、江浙吳語詞、及日語等外語借詞也經常出現。語法上的特殊用法主要是來自台灣當地方言影響，該文從構詞方式、實詞的運用、副詞、語氣詞、歎詞的用法，以及句法格式等方面考察了台灣小說中反映出的主要語法特點。該文在描寫分析台灣小說的特殊詞彙語法現象時，不用孤證，因此足以證明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例子。台灣的所謂“國語”實際上已經構成了現代漢語在孤島上的一種“變體”。

詞彙是語言內部穩定性最低的層面，因此多元文化融合的台灣華語自然在詞彙上也有相當大程度的創新。黃婷鈺（1996）分析台灣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的親屬稱謂，找出語料庫之語料與人類學者所用之語料有何不同之處，反映了台灣的社會現況：（一）國語及台語是台灣二大使用語言；（二）台灣社會是傳統與西洋的綜合體；（三）台灣的社會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姚榮松（2000）則更明確且廣泛的討論台灣閩南方言詞進入台灣華語詞彙的過程與分類標準，並暗示此為兩岸共通語之差異之一。該文觀察閩南方言詞通過報刊等文字媒體進入口語，並以此來檢驗台灣地區的新詞語。認為在台灣用的詞語中，更應細分為兩類：1、其來源為閩南語或日語、粵語借詞，但均已被台灣華語吸收（如，阿兵哥、矮化、擺平、擺烏龍、便當盒（源於日語）、賓館、播遷、慘兮兮、層級、茶敘、炒地皮、出局、出掌、打拼、歌仔戲、吉早、絞肉、金紙等等）；2、在文字上即帶有方言詞的標示或構詞之特徵（阿母、阿祖、伴手、保庇、才調、查甫仔、厝邊、歹命、代誌、讀冊、古錚、過身、活跳跳等）。

許斐紹（2000）針對台灣新詞做全方位的研究，以期對詞彙學與對外華語教學有所幫助。該文探討了外來詞的類型以及此類新詞的特點，介紹台灣華語的語言環境，並探討進入共同語的方言詞界定的問題，並且討論流行詞語的界說並研究其特殊構詞方式，最

後探討兩岸詞彙發展的分歧因素，比較兩岸構詞法。王國齡（2003）則特別研究台灣華語在日本流行文化影響之下產生的日語借詞。我們僅舉娛樂類及食品類下的一些例子：泡湯、發表、滿點、滿載、秘湯、對決、突擊、極速、攻略、上手、初體驗等；蒲燒鰻、明太子、帆立貝、天婦羅、大阪燒、定食、辛味、御便當等。在詞綴的借詞上也僅舉以下數例：～風：民族風、和風；～版：決定版、完全版；～別：血型別、地區別。

在語音上，台灣華語最為明顯的特徵也是受到閩南語及其它南方方言的影響。在維基百科“台灣華語”的項目下就列舉了以下幾點：翹舌音 [zh, ch, sh] 與舌齒音 [z, c, s] 不分；同樣需要卷舌的的 [er] 發音為 [e]，例如“二”“餓”不分、“而”“額”不分；將 [eng] 念成 [en]、[ing] 念成 [in]；當 [eng] 出現在 [b, p, m, f, w] 等子音的後面時（如崩、烹、夢、風、翁），發音為 [ong]；另外就是兒化韻與輕聲的消失。許慧如和謝國平（Hsu, Tse, 2007）深入探究台灣華語的音節末鼻音合併現象，研究發現台灣外省人與本省閩南人之間，於音節末鼻音合併現象上並無顯著差異，顯示此一音韻特徵已經等化，成為台灣華語中一個穩定的特徵。但在 [ing] → [in] 與 [eng] → [en] 何者頻率較高則尚無定論。

而張月琴（Chang, 1998）也認定台灣華語已發展定型，與1932年教育部公佈的標準國語有相當大的差距。她描述台灣國語八個單元音的語音特色，比較不同語族（閩南、客家、國語）間的差異，並與北京普通話單元音作比較。元音聲學的結果顯示閩南語、客家語族台灣華語的元音均受到母語的影響，與國語語族的元音在口腔中位置前後略有不同，而台灣華語和北京普通話的差異主要是北京普通話的元音比台灣國語的空間大，因此它的元音間彼此距離較大。Wan & Jaeger (2003) 也證實台灣華語的元音系統已與教育部頒訂之“國語”不同。此篇文章檢視幾個關於北京

話底層元音系統的假設：六元音系統、五元音系統、四元音系統，提出分佈上的、語音上的、以及心理語言學的證據，證明台灣華語的元音無法用以上的任一種假設來說明。因此根據證據提出一套新的五元音系統來說明台灣華語的元音。

Fon & Chiang (1999) 則以台灣地區國語之聲學語料研究台灣華語中聲調的特色，結果顯示台灣華語在五段聲調尺上所呈現出來的乃是等對數間距，而且調值為（為44、323、312及42）亦與以北京官話為本的制式調值-55、35、214及51-大不相同。台灣華語聲調為一四段式系統，且其調高偏低、調幅較窄。不同的原因可能基於歷史變遷，亦有可能是受斷代方言的影響。Fon, Chiang, Cheung (2004) 檢視了台灣華語中兩個非常相似的語調：二聲與三聲。實驗結果顯示，二者皆呈現抑揚調且有相似之中低音域，但三聲在抑或揚的部份皆比二聲為陡。

熊慎敬（2002）則是著重在台灣華語語句焦點之聲學表現，以SVO之句型語料，以問句引導受試者在回答的句子中產生不同的焦點位置。研究發現音長是台灣華語中表現焦點的主要聲學方式，但音強卻沒有直接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基頻範圍的增加也不像中國大陸普通話受試者表現得那樣顯著。黃宣萱（Huang, 2007）則是探討台灣華語中一聲和四聲的高聲調標是否受到方言和性別的影響，也探討焦點和方言差異的互動。結果顯示若一個音節具有焦點地位，則會呈現出方言差異。若該音節不具焦點地位，各方言在基頻上大致沒有差異。Torgerson (2005) 以聲學的方法分析探究台灣華語與北京話之間三種不同的說話類型音高及調域之不同。結果顯示台灣華語的聲調較低。

兩岸六十年來的不同環境，造就台灣華語發展成一個自主的方言，其語言特徵相當一致（參看鄧守信 Teng, 2002）。許慧如（2005, 2007）更以實證的方法驗證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口，不分族群，其台灣華

語已經“等化”。從純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台灣華語的獨立性在台灣語言學界是沒有爭議的，在國際語言學界也是如此（參看Chen, 1996, 1999及維基百科“台灣華語”條目下的書目）。

三 台灣華語的在地化

我們再從歷史的層面，追溯台灣華語的起源，檢視其發展的時空背景與人口結構，證實其在地化歷程。首先我們要對以下幾個術語做嚴格的界定。“母語”指的是母親的語言，也就是“媽媽講的話”（施正鋒、張學謙2003:4）。“第一語”則是一個人出生後所自然習得的語言，通常也就是“母語”，但並不一定是。很多台灣人的“第一語”就不是“母語”。“第二語”則是一個人在青少年之後方才習得的在地語言。

1. “國語”與第一代的語言背景

根據何萬順（2009）的研究，並沒有文獻數據直接顯示台灣外省第一代的語言背景，唯一的間接證據來自1956台灣戶口普查中約93萬外省籍人口的本籍分佈，見（表一）。

表一：1956戶口普查外省籍共928,279人之本籍分佈

本籍	人數	%	本籍	人數	%
江蘇省	95836	10.32	陝西省	6389	0.69
浙江省	114830	12.37	甘肅省	1358	0.15
安徽省	44533	4.80	寧夏省	88	0.01
江西省	30666	3.30	青海省	131	0.01
湖北省	36184	3.90	綏遠省	383	0.04
湖南省	54154	5.83	察哈爾	550	0.06
四川省	36369	3.92	熱河省	789	0.08
西康省	313	0.03	遼寧省	11220	1.21
福建省	142520	15.35	安東省	1623	0.17
廣東省	92507	9.97	遼北省	1773	0.19
廣西省	11620	1.25	吉林省	2060	0.22

雲南省	5716	0.62	松江省	387	0.04
貴州省	4545	0.49	合江省	192	0.02
河北省	36124	3.89	黑龍江	556	0.06
山東省	90068	9.70	嫩江省	479	0.05
河南省	41674	4.49	興安省	98	0.01
山西省	5282	0.57	新疆省	277	0.03
南京市	12491	1.35	大連市	600	0.06
上海市	16179	1.74	哈爾濱	490	0.05
北京市	7850	0.85	漢口市	1618	0.17
青島市	5777	0.62	廣州市	924	0.10
天津市	5293	0.57	西安市	115	0.01
重慶市	994	0.11	瀋陽市	2264	0.24
海南	1817	0.20	蒙古	338	0.04
西藏	16	0.00	未詳	219	0.02

（表一）的本籍分佈可以證實外省第一代的母語分佈涵蓋了整個中國大陸，亦即漢語語系的地理範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北京人僅佔0.8%不到1%，因此可見外省第一代中以北京話為第一語或母語的人是非常少的。但確有超過兩成來自吳語區，兩成半來自閩粵語區。外省第一代絕非單一語族，更不是以北京話為族群母語的單一語族。

為了要對台灣當時整體的語言環境有比較全面性的了解，我們仍須檢視佔人口多數的本省第一代（1950前出生）語言背景。在日本統治下日語普及運動長達五十年後，本省人中已有超過七成的人口接受過日語教育；根據黃宣範（1993:96）的形容，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主要是使台灣從單語（僅操漢語方言）變為漢語、日語並用的雙語社會，而其中日語主要用於學校或官廳，其它公共場所似仍未普遍，更談不上侵入親密的家庭領域成為“家庭語言”。（黃宣範，1993:96）

可見本省第一代的母語及第一語仍舊是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語言，多半的人也有使用日語為“第二語”的能力，但是能說北京話的是少之又少。因此，

第一代人口的整體語言背景是相當複雜的，涵蓋了漢語語系下所有不同的語言加上日語，但是本省外省之間卻沒有共通語，而其中最多只有不到1萬人以北京話為第一語。但是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必須要有一個共通語的現實下，以及政府推行“國語”（北京話）的高壓政策下，這些具有多元語言背景的第一代也不得不學著使用這個新的語言。因此，第一代所勉強使用的北京話是一個類似“溝濱語”（pidgin）的中介語。何萬順（2009）因此將本省第一代的“台灣國語”以及各種外省鄉音濃重的“鄉音國語”稱之以“溝濱國語”。

2. 台灣華語與第二代的語言背景

外省第二代（1950–1970出生）就是在以上所描述的多語言接觸下生長的，生活中接觸到的是各種不同的漢語以及“溝濱國語”；而在正式教育中以及廣播電視電影裡又聽得到或多或少近似標準的北京話，這也是為什麼外省第二代散居全台各地，母語分歧而且絕大多數母語並非北京話，但卻發展出相當一致“等同化”（*koineization*）的台灣華語（許慧如，2005）。由“溝濱國語”的下一代所創造出的“台灣華語”因此合乎“克里奧爾語”（creole）的定義。

（表一）中顯示外省第一代中有超過25%的人口是福建或廣東人，因此也可能是閩南語或客語的母語人口。此外，有將近六成的外省第二代因為媽媽是本省人（王甫昌，2001:60），因此以閩南語或客語為母語，亦極可能為第一語之一。但是除了閩客之外，外省第二代的多數母語，尤其是父語，在“國語”政策的壓抑下，再加上外省族群當中並無法提供足夠的父母語人口、父母語文化及社會支撐，因此完全失去生存的條件。黃宣範（1993:244）的觀察是準確的：“大陸方言絕大部分到了第二代已經消失”。在喪失母語及父語的這一個特點上，創造台灣華語的外省第二代與其它克里奧爾語的第一代是相同的。

同為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的本省第二代同樣的也接受了大量“溝濱國語”的接觸與“國語”政策下的正規教育，因此也是“台灣華語”的“始祖”。但是與外省第二代不同的是，本省第二代在進入正規教育前的第一語絕大多數是其母語，也就是閩客（黃宣範1993:225）。但是本省第二代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母語是台灣本土語言，有母語族群的文化及社會支撐。這個事實讓大部分本省第二代在習得台灣華語的同時，雖然有“國語”政策的打壓，但仍得以保有母語為第一語。

從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達到三個結論。一、無論是外省或本省，第一代以“國語”或北京話為母語或第一語的人口是少之又少，他們被強迫使用的“國語”或北京話是第二語。二、絕大多數的外省第二代以新生的台灣華語為第一語，其中至少有四成的人口不具母語能力，其它六成則有閩客母語的能力。三、多數的本省第二代具有台灣華語及閩或客之雙語能力。

在1990後出生的台灣人口，也就是當今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毫無疑問的絕大多數以台灣華語為第一語，其中也多半以其為母語。台灣華語因此得到了兩個重要的在地化特徵：一、這是完全在台灣的土地上、完全由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所創造出的第一語。二、這個新生的第一語也已是絕大多數第三代的新母語。

3. 台灣人的語言能力與語言態度

早在1993年台灣就約有82.5%的人口使用台灣華語（黃宣範，1993:225）。五六十年來台灣的正式教育均以台灣華語進行，因此可以將識字能力視為使用台灣華語的能力。根據2006.4.13的《內政統計通報》，2005年年底時全台國民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為97.3%，15~34歲者識字率更高達99.96%，可見台灣華語的人口至少佔台灣總人口九成以上，遠超過其它語言的人口

(參看洪惟仁 2002:530)。台灣華語確實已經是台灣各族群的語言，已經“等同化”(許慧如，2005)，通行性最高，因此“不具備華語能力在台灣各地通行所受的影響最大”(陳淑娟，2004:282)。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其他的台灣語言，台灣華語已不是一個可以拿來界定任何族群的語言(何萬順，2009)。因此，台灣華語已是本土產物，因為台灣華語只有台灣人使用，而且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使用台灣華語。

本土學者排斥台灣華語的主因之一是台灣華語嚴重排擠了本土語言的正常發展。確實，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高壓國語政策，造成數十年來台灣華語的強勢地位，也對於在地語言造成嚴重傷害。這似乎已形成了台灣華語的“原罪”。然而，台灣人目前的雙語或多語能力究竟如何？(表二)是王甫昌(2001:415)所做的調查，十分值得參考。受訪者的自評分數10分是“十分流利”，0分代表“完全不懂”，5、6分為“普通”。

與“國語獨大”刻板印象不同的是，最右一欄的合計數據顯示台灣人在三個語言當中流利度最高的是閩南語(7.79)，並非台灣華語(6.66)。這與蔡淑鈴(2001: 85)根據1999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所做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國人台語能力

(8.3) 超過台灣華語(6.9)。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閩南人的台語能力(8.44)其實超過外省人的台灣華語(8.22)。可見台灣華語的發展並未對在地語言造成無法逆轉的傷害。

台灣華語雖然已有了在地化的事實，但是台灣人整體上對於這個語言的態度也應當是其定位之重要考慮。換言之，櫻花鉤吻鮭雖然在事實上是台灣本土產物，但是假若台灣人在心理上棄之如敝屣，它的本土地位也不具意義。王甫昌(2001: 413)針對不同族群對不同語言的態度也做了調查，請見(表三)。

台灣華語整體得分最高(7.53)，但與台語(7.48)的差異並不顯著。可見台灣人並非將多語言的存在視為衝突或戰爭，台灣華語和台語可以同樣優美。因此，若將台灣華語視為台灣人民的“外語”或“第二語”不僅違背語言事實，也不符合台灣人的語言心理。無論從語言事實、使用人口分佈、與態度而言，最好的答案都是台灣華語已經是台灣的在地語言。

四 結論

台灣華語雖然沒有櫻花鉤吻鮭一萬五千年的歷

表二：台灣各族群的語言流利度

N=3486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合計	差異顯著的組別
國語	6.27	7.60	8.22	6.20	6.66	閩-客； 閩-外； 客-外； 客-原； 外-原
閩南語	8.44	6.36	6.34	3.67	7.79	閩-客； 閩-外； 閩-原； 客-原； 外-原
客家話	5.52	7.38	1.22	0.48	1.30	閩-客； 閩-外； 客-外； 客-原

表三：台灣各族群認為語言優美的程度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合計	差異顯著的組別
國語	7.31	7.90	8.36	7.76	7.53	閩-客； 閩-外； 客-外
閩南語	7.66	6.91	7.19	6.28	7.48	閩-客； 閩-外； 閩-原； 客-原； 外-原
客家話	5.15	7.41	5.84	5.65	5.60	閩-客； 閩-外； 客-外； 客-原

史，但是像櫻花鉤吻鮀一樣，它的前身因為時空的巨變而滯留台灣，一代接著一代的傳承與改變，適應在地的文化、社會與語言生態，繁衍至今。從語言事實上來看，台灣華語已經形成自主的華語“亞種”，有其獨特的語言特徵。本文從語音、詞彙與句法上列舉出許多研究，再證實台灣華語自成系統的自主性。我們並且從台灣戰後的人口結構及語言背景來觀察，提出確實的數據為佐證，台灣華語並非第一代的母語，亦非第一語，而是外省第二代所發展出的第一語，並非母語，因此是台灣新生的語言；經過了四個世代的傳承，如今已經充分的地化。

多語言文化是台灣的宿命。即便是我們將台灣華語排除在台灣語言之外，甚至假設台灣華語不存在，台灣的語言問題在本質上並不會改變；此時台灣閩南語必然會是最強勢的語言，客語及原住民族語（阿美、泰雅、排灣、布農、噶瑪蘭、卑南、魯凱、鄒、賽夏、雅美、邵等）依舊會相對弱勢。即便是台灣的三個漢語通通不存在，僅有原住民語，台灣仍舊必須是多語言文化社會。既然離不開這個宿命，我們與其彼此排斥、相互衝突，何不接受台灣華語在地化的事實，學習包容，進而欣賞不同、享受多元。

（本文作者感謝研究助理陳翰文、陳孟英、馮筱茜、黃婉茹、黃婉婷、李苡瑄、盧怡叢、甯俐馨、吳光中、謝依庭與何郁瑩所提供的協助。但本文內容由作者負責。部分研究經費來自國科會計劃96-2411-H-004-037，特此致謝。本文獻給我在天上的父母親。）

參考文獻：

- 蔡美慧. 1992.《台灣國語的肯定與否定首位答詞》，輔仁大學碩士論文。
- 蔡美智. 2002.《山台灣國語的語法特點看共同語、方言之互動》，第四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學術國際研討會。
- 蔡淑鈴. 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1:65-111。
- 陳淑娟. 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何萬順. 2009.《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0.2:375-419。
- 何萬順. 2005.《“全球化”與“在地化”：從新經濟的角度看台灣的拼音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4:785-822。
- 洪惟仁. 1995.《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論文集》，119-158。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 洪惟仁. 2002.《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收錄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501-542。台北：前衛出版社。
- 黃國營. 1988.《台灣當代小說的詞彙語法特點》，《中國語文》第3期（總第204期）。
- 黃婷紅. 1996.《台灣地區漢語親屬稱謂：一個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靜宜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馨慈. 1995.《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看台灣國語裡的一些句法變化》，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宜範. 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海出版社。
- 蔣為文. 2005.《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盧廣誠. 1996.《華語中的“有”字句在台灣的使用情形及其社會意義》，《台、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169-181。台北：遠流出版社。
- 施正鋒、張學謙. 2003.《語言政策及制訂“語言公平法”之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
- 王國齡. 2003.《台灣中文詞彙之新日語借詞研究：日本流行文化影響之下產生的新借詞》，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王甫昌. 2001.《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收錄於劉兆佳、尹寶珊、李明聖、黃紹倫編，《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393-4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熊慎敬. 2002.《台灣華語語句焦點之聲學表現》，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慧如. 2005.《台灣華語的幾個等化現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博士論文。

- 許慈如. 2007.《重回台灣華語等化的過程》, 國科會研究計劃NSC 95-2411-H-033-008。
- 許斐鈞. 2000.《台灣當代國語新詞探盤》,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惠慈. 2000.〈台灣華語“訊xiū”與閩南語“清kóng”的對比分析〉, 《第六屆世界華文研討會論文集II》, 154-169。台北:世界華文教育促進會。
- 姚榮松. 2000.〈論台灣閩南方言詞進入國語詞彙的過程〉, 《華文世界》95:34-46。
- 余瑞瑩. 2004.《中文否定詞“沒有”的言談功能》(Discourse Functions of Negative Meiyou in Taiwan Mandari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心怡. 2003.《當代台灣國語的句法結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瑞芬. 2001.《“說”和“看”的語法化過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
- Chang, Yueh-Chin. 1998. Taiwan Mandarin vowels: An acoustic investigatio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8.3:255-274.
- Chen, Ping. 1996. Modern written Chinese, dialects, and regional identit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3:223-243.
- Chen, Ping. 1999.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 Robert.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Duanmu, San.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Fon, J. and Chiang, W.-Y. 1999. What does Chao have to say about tones? -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13-37.
- Fon, J., Chiang, W.-Y., and Cheung, H. 2004.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 two dipping tones (Tone 2 and Tone 3) in Taiwa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2:249-281.
- Hsu, Hui-Ju and Tse, Kwock-Ping, John. 2007.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 in Taiwan Mandarin—leveled but puzzling. *Concentric*, 33,1:1-18.
- Huang, Y.-H. 2007. *Dialectal variations on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tonal targets in Taiwan Mandarin*.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Kubler, Cornelius C. 1979.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Mandarin and 'Textbook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4.3:27-39.
- Kubler, Cornelius C.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Lee, Chia-Chun. 2007.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The Case of Get3 in Taiwanese Mandar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Sanders, R. M. 1992. The expression of modality in Peking and Taipei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1-23.
- Swihart, D.-A.W. 2003. The two Mandarins: Putonghua and Guoyu.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8:103-118.
- Teng, Shou-Hsin. 2002. *Defining Taiwanese Mandarin*.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Plurilingual Contexts*, ed. by Daniel So and Gary Jones, 230-240. Brussels: VUB Brussels University Press.
- Torgerson, Richard C. Jr. 2005. *A Comparison of Beijing and Taiwan Mandarin: An Acoustic Analysis of Three Native Speech Styles*. MA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 Wan, I-Ping and Jaeger, Jerry. 2003. 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 Mandarin vowels: A psycholinguistic stud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205-257.